

经济周期、财政政策与价格波动的联动规律^{*}

——以1990~2016年数据为观察区间

刘安长

摘要 本文以 1990~2016 年的数据为观察对象,探究了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和价格波动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物价指数的峰值要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峰值,但在谷位运行时两者则保持相同的步调。财政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可以对价格波动进行干扰,即价格指数会随着财政政策松紧程度而上下起伏,在物价指数低迷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助其走出通缩,在价格指数高企时,紧缩性财政政策可防止其走向通胀,从而减轻经济周期波动对价格造成的影响。针对现阶段经济周期与价格波动中潜藏的风险,建议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进行“辨证治疗”,以促进经济“肌体”健康发展,使得经济增长和价格波动回归合理区间。

关键词 经济周期 财政政策 价格波动 联动规律

中图分类号 F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730(2017)03-0014-09

2017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2016年经济“成绩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7%;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涨幅与前三季度持平;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4%,自9月份起结束连续54个月同比下降后,同比涨幅不断扩大,12月份同比上涨5.5%,环比上涨1.6%;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下降2.0%,12月份同比上涨6.3%,环比上涨1.9%^[1]。由此,通过纵观近五年的

经济数据发现,我国经济增速下行自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至今,已经持续了27个季度。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2011年达到阶段性峰值5.4%后,也开始一路下滑,特别是2012年9月份,CPI又重回“1时代”,2014~2016年大部分月度数据均在1%~2%徘徊,甚至引起部分学者认为通货紧缩时代来临^[2]。而此时,财政政策在这一阶段也有了新的表现,虽然还是“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但摒弃了以往大规模的刺激,而更加突出“精准”、“定向”和

“微刺激”相对金融危机阶段而言,整体略显紧缩。随着经济增速和价格指数的进一步下滑,“滞”与“缩”的风险进一步凸显,政府采取了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以防止两类指数(GDP与CPI)进一步下探,2016年“两会”把赤字率首次提升到3%的国际警戒线就是证明。由以上动态变化初步判断,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即价格波动三者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有必要探索三者之间的联动规律,为本阶段的经济形势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价格波动周期

利用“谷——谷”法,描绘我国1990~2016年的价格波动^[3]情况,如下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得知,我国近27年的价格波动呈现出五个周期:1990~1999年为第一个周期,因1989年对通货膨胀的成功治理,CPI指数开始回落,1990年为波谷期,谷值为3.1%,随着一大波投资热的兴起,经济开始出现泡沫,通货膨胀现象凸显,到1994年CPI达到峰值24.1%,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值,中央政府及时采取紧缩政策,价格逐步回落,到1999年又回到波谷,谷值为-1.4%,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值。因此,本阶段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波动幅度最大的一个周期。1999~2002年为第二个周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趋冷,价格回落,1999年CPI指数跌至本轮周期的谷底-1.4%,为应对危机,政

府采取宽松的经济政策,CPI指数缓慢攀升至2001年的波峰0.7%,但随后又回落至2002年的谷底-0.8%,该周期持续时间较短。2002~2006年为第三个周期,受宽松政策的滞后性影响,此周期在2004年达到波峰,峰值为3.9%,到2006年回落到1.5%的波谷,2006~2009年为第四个周期,2008年为峰值,达5.9%,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又回落至波谷,并出现负值-0.7%。由于2008年底推行的4万亿“救市计划”,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使得价格又开始回升,即第五周期从2009年开始至今,该阶段在2011年达到峰值5.4%,此后因经济步入下行周期,CPI指数也一路下滑,谷底尚不可知,学界甚至因此判断通货紧缩来临。

从以上图形观察可大体归纳此段时间我国价格波动周期的特点:(1)周期性波动明显。在这5次明显的价格周期性波动中,第一次波动幅度最大,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峰差为25.5,并且持续时间最长,达10年。随后的波动周期较短,且幅度缩小。(2)价格走势前高后低。1997年以前的价格指数平均增幅达9.98%,特别是1993~1995三年平均增幅达18.63%,归属于严重通货膨胀之列。而之后至今平均增幅仅为1.9%。导致该现象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前的价格属于管制价格,国家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的政策。自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以后,价格管制也逐渐放开,投资、消费出现无节制的增长,导致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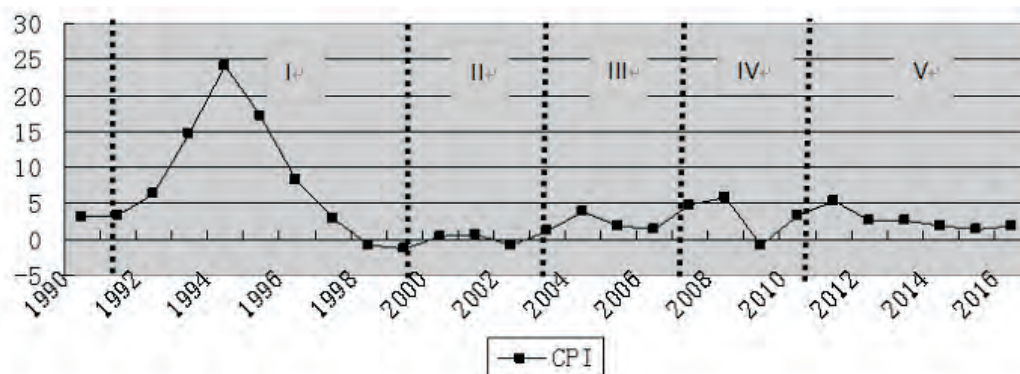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1990-2016年CPI指数

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走向成熟,经济调控手段也日趋完善,价格水平也开始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3)各周期波动的成因不一。第一周期价格波动源于成本推动型,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掀起了一轮投资热潮,上游产品价格大涨,引发下游产品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所有产品价格全线上涨;第二轮与第四轮均有宽松政策导致的上涨,即均面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采取了宽松的经济政策;第三轮与第五轮则是经济宽松政策的滞后反应所致。

二、经济周期与价格波动周期的联动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在波动中持续高速增长,并且这种波动带有一定的周期性,而价格是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波动的。以1990~2016年为观察对象,如下图2所示:在1998年以前价格是随着GDP增长率大起大落的,1998年以后,GDP增长率开始趋向平稳,到2007年达到新高位后,逐步回落,受宽松经济政策的影响,在2010~2012年有短暂的回升,随后又步入下行区间,一直持续至今。而价格波动在1998年GDP增长波动趋缓后也逐渐逐渐平稳,并且有较长时间在低位运行,2008年和2011年达到阶段性高度,2011年以后CPI上涨率又开始低位徘徊,2014~2016年度有多个季度重回“1”时代。

从图2中可以观察并归纳出两者之间的联

动关系:(1)价格波动的峰值要滞后于GDP增长率的峰值。因本文研究的时序为上世纪90年代后,如果前溯至1978年,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这一滞后期大约1~4年。例如,1992年是经济增长的波峰年,增长率高达14.24%,但CPI并非本轮周期最高值,只有6.4%。这一轮CPI增长的峰值在1994年为24.1%,但此时经济已经开始回落,下降到了13.08%,滞后期为2年;在最近的一轮波峰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峰值,为14.16%,而CPI的峰值则在2008年才出现,而此时经济增长率骤降近5个百分点,滞后期为1年。(2)价格波动与经济增长在低位运行的步调保持一致。即最低的价格波动发生年份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是大致吻合的。如1990年,价格运行至波谷,经济周期也处于谷底阶段;1999年两者又同时达到谷底。从区间段来看,1998~2003年是经济运行的低位阶段,此时价格也在零界点徘徊,甚至有两年处于负增长;2012至今经济走入下行通道,价格水平也在此阶段跟着回落。

因此,经济周期与价格波动周期的特点表现为:经济增长上升达到峰值后,价格往往滞后一段时间达到峰值;经济增长下降至谷底后,会把价格同步拉入谷底。这表明经济增长回落对价格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增长上升对价格的影响。对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价格黏性所导致。即在市场机制中,产出变动机制总是滞后于价格变动。因为当供求失衡时,厂商总是首先通过调节产量来寻求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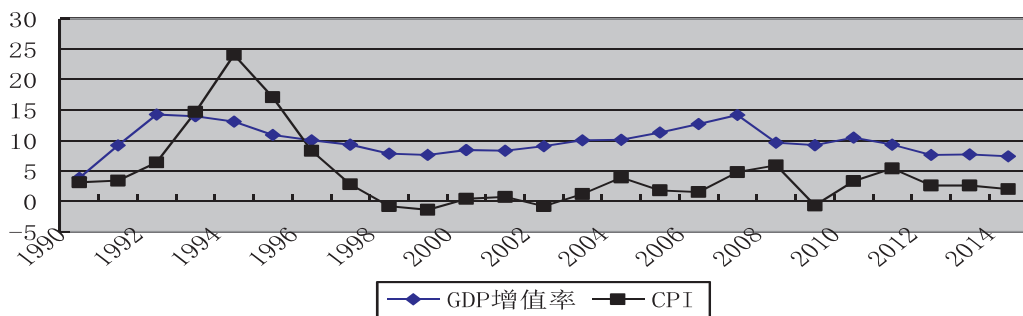


图2 1990-2016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与CPI上涨率对照曲线

衡,只有失衡一段时间后才通过改变价格来平衡供求关系。因此价格波动总是滞后于产出波动。那既然价格波动滞后,那当经济运行至波谷时,价格也应当滞后一段时间才达到波谷,为何现实情况中确实保持同步呢?即如何解释1990年和1999年两者同时达到谷底呢?这是因为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价格的调节虽然也会滞后于产出调节,但是滞后期相对较短,不到1年,一般以月份来计算。但本文CPI上涨率的数据均是年度数据,所以无法反应出这种微弱的变化趋势。

三、财政政策与价格波动的联动关系

传统理论认为,价格波动是一个纯货币问题,并且即使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的价格波动,其本质也是一种货币现象。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FTPL理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在价格波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从实践层面使用财政政策来影响价格水平了。

(一)财政政策与价格波动关系的判断

财政政策能影响经济周期,而上述分析又表明经济周期波动与价格波动是联动的,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财政政策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价格波动的。把图2稍作修改得到图3,该图中包含三个变量:财政政策、经济增长率、CPI上涨率。从图中

可大致判断:从1994年后开始,为抑制经济过热,实施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经济增长率下降,CPI也跟着回调,正向关系明显;199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回暖,而CPI却在此阶段经历了一个波动周期,从波谷上升到波峰又在2002年跌回谷底,关系不是特别明朗;2004~2007年虽然采取的是中性财政政策,但该阶段实质上是带有扩张的性质,因此经济增长与CPI增长大致呈现上升趋势,尽管CPI在此期间有所波动;而在最近的一次扩张阶段则表现较为复杂,通过4万亿的刺激,经济增长率在2009~2011年作出了上升的回应,随后下跌,而CPI则在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2010年回升,2011年达到峰值,而此时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回落。尽管2012年以后一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经济增长率与CPI均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持续低位运行。从该图中难以很清晰的反映出财政政策与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加清晰的反应两者的关系,引入财政支出、CPI、M2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等变量进行分析。此外还借鉴高铁梅(1998)的做法^[4],利用CF滤波法截取2002年1月至2014年1月这一时间序列进行滤波,并将趋势要素和循环要素分离后得到周期序列^[5],如图4、图5所示:

通过图4可以判断,财政支出与CPI的涨跌趋势大致保持一致。如在2003年9月~2004年8月,2006年11月~2008年4月,2009年11月~2011年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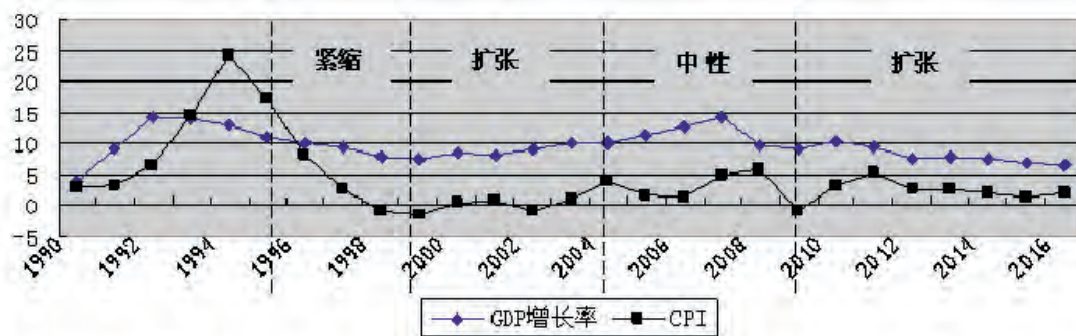


图3 1990-2015年中国的财政政策、GDP增长率及CPI上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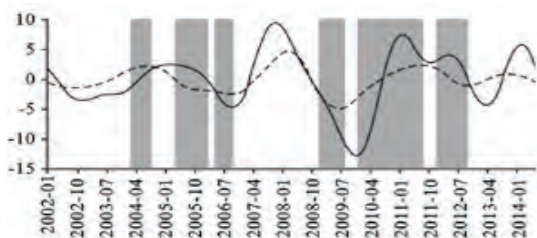


图4 财政支出增长率与CPI周期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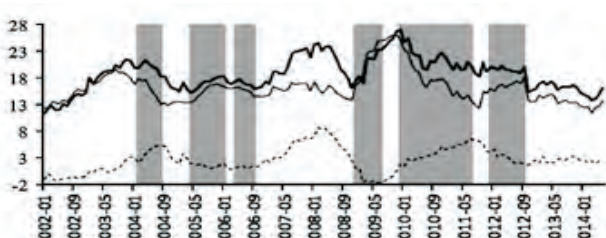


图5 M2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及CPI序列

注：图4中实线表示财政支出增长率，虚线为CPI；图5中，粗线为M2实际增长率，细线为名义增长率，虚线为CPI。

月，我国出现了三轮较为明显的价格上涨，而此时的财政支出也保持着较快增长。特别是在2008年1月，财政支出实际增长率达到54.5%，而CPI则在次月达到8.7%的峰值。在图5中，CPI增长率与M2的波动也大致趋同，但是在少数时区两者的运动轨迹是背离的，图中的6个阴影部分表示的是CPI与M2的波动相反。而对照这6个区域，在图4中的相应位置进行描绘发现，这些阴影部分表现出CPI增幅与财政支出增幅保持相同方向的运动轨迹。以图5中，M2与CPI增幅背离时间较长的区间2019年12月~2011年7月为例，此前一直出现较为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国家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在2010年先后6次上调准备金率。而此时财政政策并没有配合相应的货币政策，反而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如2011年1月财政支出实际增长率高达66.2%。因此，虽然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了总需求，但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效果，造成M2与CPI增长背离的现象发生。从另一个角度却反映了财政政策对价格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判断，财政政策与价格之间存在较强关联度的。

（二）我国财政政策演进过程中的价格联动规律实践

从1993年开始我国财政政策经历了紧缩——扩张——中性——扩张的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的政策演变过程中，价格波动有不同的表现，甚至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财政政策来影

响价格波动。

1993年以来，由于受“南巡讲话”及市场经济地位逐步确立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突然被无节制的释放，上下游产品的价格飙升，1993~1995年三年的CPI平均增幅达18.63%，处于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的最高水平。此时，国家决定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抑制这种过热的需求，货币政策也给予了相应配合，在存贷利率、信贷规模、货币供给等各方面都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在1994年还进行了价格体制、外汇体制、财税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改革，虽然短期内无益于控制通货膨胀，甚至还因触及各方利益有可能增加紧缩政策推行的阻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较为成功的限制了财政较为宽松的状态，控制了赤字规模，有效地平抑了通货膨胀，使中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但偏紧的财政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如上述的体制改革中，财政体制改革一直踟躇不前，财政收支矛盾依然凸显，并且因紧缩政策的力度难以把控，虽然有效地抑制了通胀，但也为下一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埋下了隐患。

1997年我国虽然成功抑制了价格连续攀升的态势，但却走入另一个极端：价格急速回落，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1996年CPI增幅比上一年下降8.8个百分点，1997年降到3%以下，到该年的10月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种低速甚至负增长态势一直持续到2003年。与此同时，1998年亚洲金融危

机的爆发、南方洪涝灾害使得我国经济雪上加霜。为应对危机，政府连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刺激，但效果甚微，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凯恩斯区域”，货币政策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因此政府及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该阶段的政策主要以增发国债刺激投资为主，但并没有采取减税政策。这次政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不仅有效的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推动了经济较快的发展，同时也使较为低迷的价格指数开始抬头，2004年的CPI增长率已经上升到3.9%，扩张性财政政策较好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连续六年的扩张政策，使得赤字率与国债负担率大幅攀升，财政风险逐步扩大，如果不加以控制又有可能回到通货膨胀状态，因此中央在2004年开始推行中性的财政政策。

从2004年推行的中性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此期间，赤字率与国债负担率得到较好控制，物价趋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GDP又回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同时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更趋向合理。但到了中性财政政策推行的后两年，经济政策开始带有较强的扩张性意愿。不仅GDP增长率达到历史新高，CPI增长率在2007、2008两年分别达到4.8%、5.9%，处于近十年最高点。

2008年至今实行了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2007年底，央行发布了通货膨胀风险：一是能源价格面临上涨压力；二是粮食价格有可能引发价格上行；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总水平。中国经济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胀的风险。因此，政府在年底的宏观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双防”的宏观调控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南方冰灾及汶川地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下滑风险加大，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凸

显，总体物价水平在高位剧烈震荡，通货膨胀风险进一步加大。因此，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由“双防”到“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到2008年底，中央最终采取了以“4万亿”为主题新一轮扩张性政策，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宽松的货币政策。此轮扩张性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与上次不同，上次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采取的，而这次恰好相反，经济中出现了通货膨胀。并且此次扩张性财政政策还配合了结构性减税这一措施。此轮调控，经济复苏效果明显，GDP增速在2010年又回到两位数的增长，但通货膨胀并没有因此受到遏制。虽然受负面影响最大的2009年，其CPI增幅下降到了负值，但随后三年CPI增幅持续上升，2011年达到5.4%的峰值。这其中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影响不无相关。2012年以后，我国虽然还是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调，但相较于之前略显紧缩，且新一届领导人对经济的调控思路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强调大规模刺激，而是注重定向“微调”和“微刺激”。此时，我国经济受多重因素影响，已步入下行区间，从2012年GDP增速“破八”后一直持续至今，而CPI增幅更是重回“1时代”。尽管如此，政府也并没有因此改变调控思路，强调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即可，调控重心还是要回到调结构上来。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做主旨发言时表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足可见中央对之前大规模扩张性刺激的反思及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

四、结论、展望与启示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经济周期与价格（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理论一直以来是研究的热点，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是顺周期的，即经济的增长必然带来价格的上升；也有认为是逆

周期的,以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Kydland(1991)为代表。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两者关系并不稳定,既有可能正相关,也有可能负相关(King,1996)。这可能与选取的观察时间段及假设条件不同有关。而财政政策与价格存在相关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被认可,正如Friedman所指出的“通货膨胀总是而且永远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直到上世纪90年代,Leeper(1991)提出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后,两者的关系才得以诠释。这一理论本质上是根源于利息价值理论的,即利率的变动促使人们在持有债券和持有货币中做出选择,进而使财政政策能影响到人们的消费选择,从而改变供求均衡点,最后影响到价格水平。这一系列理论虽然观点各异,但都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尽管这种两两关系研究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相对比较成熟,但对三者联动规律的研究却较少有文献涉及。其实三者之间规律的研究不仅对经济趋势预测,同时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是极其有参考价值的。

本文以中国1990~2016年的数据、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政策实践考察等发现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和价格波动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联动规律的:在经济周期下行时期,经济萧条,企业开工不足,国内需求萎靡,价格探向谷底,而此时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根据宏观经济AD-AS理论,可以使得总需求曲线右移,价格水平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从供给侧而言,如果压缩过剩产能,则会使总供给曲线左移,同样会达到提升价格水平的效果。两者的共同作用,会使得效果更佳,从而走出通缩风险。反之,如果在经济过热时期,物价水平上涨,通货膨胀风险凸显,此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会产生与之前相反的作用效果。这也是三者产生联动规律的经济理论逻辑。

展望未来的经济走势,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内外需不振、潜在经济增速下

滑等一系列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并纵观近5年的经济走势,我国经济周期似乎也有可能进入下行阶段。但如前所述,尽管经济增速已经连续27个季度下降,可下降的趋势是有变化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细分为大幅下降区间和降幅趋稳区间,如图6所示。大幅下降区间是从2010年第1季度到2012年第3季度,经济增速从12.2%回落至7.4%,降幅达4.8个百分点,2012年第3季度-2016年第4季度,由7.4%降至6.8%,降幅收窄到0.6个百分点,趋势渐稳,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还是存在。无论不确定性因素多么复杂,未来经济无外乎从以下四种走势判断:(1)进一步探底。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甚至无法保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2016-2020年经济增长6.5%的底线。这样,各种系统性风险将暴露,经济大面积衰退,这是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2)保持现阶段的经济增速,持续在7%左右走平;(3)缩短经济下行周期,重回2008年以前的两位数增长率。但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产能过剩、各项刺激政策乏力,且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不再搞“强刺激”政策的背景下,这一走势难以实现;(4)即图6中曲线末端的折线部分,该折线的政策含义是遵循经济波动的规律,以合理区间为主线,经济增速围绕此区间上下波动均为正常现象,但要控制好波动的幅度,避免大起大落。并且在国家适当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创新创业等一系列利好因素的作用下,经济趋势理应向好,第四种走势将是大概率事件,并且也符合决策层可以接受的趋势,但也要预防第一种情况的发生。

反应在价格方面,受针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而采取的“4万亿”大规模财政政策刺激的影响,价格指数在2011年攀至5.4%的峰值,甚至有学者呼吁要谨防政策刺激后的通货膨胀效应。但随着政策效应的逐步消失及经济下行趋势的影响,CP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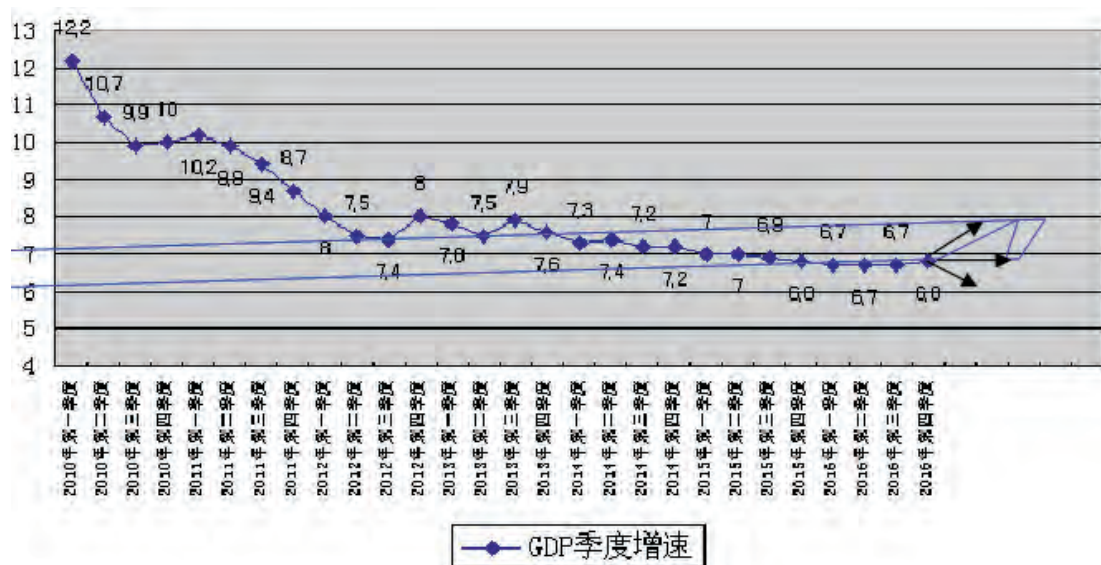


图6 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判断

与PPI指数一路下滑，通货紧缩风险凸显。2015~2016年尽管有“猪周期”、房地产市场回暖等因素的刺激，我国价格指数从2015年开始至今有缓慢回升，但生猪存栏数正逐步企稳回升，饲料成本推动猪肉价格上涨的空间有限，猪肉替代品价格不升反降，这一系列供给端的改善使得猪肉后期价格上涨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2016年10月，国内14个城市密集发布新的楼市调控政策，多地重启限购限贷，房地产市场降温明显。这使得这一轮由“猪周期”和房地产市场回暖带动的价格上涨动力正在消失，并且在经济周期下行的大背景下，需求侧不振和供给侧过剩的格局将对价格上涨构成压力，正如经济学家所担忧的是我国依然存在通货紧缩风险。

针对经济周期和价格波动中出现的风险，我国现阶段的应对之策是调控与改革并行。根据以往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政府更偏向于需求侧调控，但纵观我国多年的宏观调控史，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当经济增速下行时，便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策实施以后，过度的财政投资、赤字政策、货币投放明显地推高了我国的物价总体水平，国家又要采取紧缩措施来抑制

通货膨胀，而由于力度的控制不当，又有可能滑向通货紧缩风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轮新的调控，同时也是对上一轮调控的纠错，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单纯地利用财政政策解决经济下行或价格问题，不仅治标不治本，甚至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为此，根据上述经济理论，可以对当前经济问题采取“辨证治疗”，即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挥作用，促进整个经济“肌体”健康发展，从而使GDP增速、价格指数等回归合理区间。因为供给侧的改革可以使我国经济结构趋向合理，达到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目的，需求侧调控除了保证在上述第四种走向时熨平经济周期和价格的大幅波动，同时还可以为供给侧改革保持必要的宏观经济景气条件。具体而言，财政政策在总需求方面可以从加大投资力度、提升赤字率、刺激国内消费和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入手；而在总供给方面，则可以通过压缩过剩产能、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以减轻企业负担、以财税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鼓励企业淘汰无效供给和扩大有效供给，即在促使总供给曲线左移的同时优化供给体系，“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

变化”^[6] ,达到宏观经济供求关系动态新均衡^[7]。

注释：

[1]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所得。

[2]王军：《通胀不足为惧，通缩更需关注》，《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1期。

[3]如未做特别说明，文章中所指的价格特指消费者物价指数。

[4]高铁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5]李鹏等：《我国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现象吗？——基于财政支出视角的时变参数研究》，《财贸研究》，2015第3期。

[6]习近平：《适度扩大总需求扩大有效供给》[EB/OL] 新浪新闻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1-26/doc-ifxnuvxc2009521.shtml> 2016年1月26日。

[7]摘自2016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表述。

参考文献：

[1]荣幸子、蔡宏宇：《我国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基于价格水平的财政政策决定理论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15年第1期。

[2]崔惠民、马涛、崔永：《中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1952~2012》，《经济学家》，2014年第4期。

[3]宋美喆、晏艳阳：《财政支出的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及政治机制的有效性评价》，《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4]贾康、苏京春：《经济学的“新框架”与“新供给”：创新中的重要联通和“集大成”境界追求》，《财政研究》，2015年第1期。

[5]崔友平：《我国价格水平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实证分析与对策》，《中国物价》，2007年第3期。

[6]慈向阳、杨咸月、黄志敏：《政府支出与GDP增长关系研究》，《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1期。

[7]董秀良、帅雯君：《中国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13年第3期。

[8]黄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动及效果——兼两种价格决定机制下的比较》，《商业研究》，2016年第11期。

[9]刘安长：《我国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目标的传导效应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

*基金项目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供给侧改革下的财政政策着力点及政策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安长，中国财政科院研究院博士后，湖南女子学院经管系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04。

（责任编辑：曹暄）